

中国抗日战争与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K265
32

BC17124

中国抗日战争 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年·北京



B

483376

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永乐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7.625 印张 200千字

1988年4月北京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5600 册

ISBN 7-80023-028-7/K·81

定价：2.10元

目 录

论抗日战争.....	李 新 (1)
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中的地位 and 作用.....	钟永江 蔡志方 (22)
论中国战场和中国战区.....	阮家新 (50)
论抗日战争在中国民主革命中 的历史地位.....	肖一平 陈登才 (63)
论解放区战场的历史地位.....	袁 旭 (88)
抗日战争初期的两个战场.....	王 沛 (101)
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几个问题.....	王秀鑫 (116)
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外交 政策.....	孙其明 刘以顺 (133)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唐培吉 王 伟 (151)
论抗日战争后期的苏联对华政策.....	王 真 (173)
苏联出兵和东北解放.....	王元年 白玉武 (194)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概况.....	小林清 (211)
卢沟桥事变的由来.....	史会来 (222)

编 后 记

论 抗 日 战 争

李 新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每次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都以失败告终，只有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奋战，才取得完全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收回了由于不平等条约而失去的一部分主权，也收回了除香港以外的大部分失地。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抗日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自明的。

抗日战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本文仅就以下三个层次来论述。

(一)

抗日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一场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制定出一套推动抗战，坚持抗战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引导抗战取得彻底的胜利。卢沟桥的炮声一响，中国共产党立即号召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开展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不久，中国共产党制订并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必须发动全民参加抗战的完全正确的全面抗战路线。1938年5、6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科学地论证了抗战

必然持久、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并提出了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方针。《论持久战》和毛泽东同志在抗战中的其他著作，对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凡是按照这些正确方针进行抗战的，就取得胜利；反之，无不遭受挫折和失败。

在抗日战争中，我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经验十分丰富，有许多重要的创造。

在对敌斗争方面，我党在解放区战场开展了一场最广泛、最深入的异常雄伟壮烈的人民战争。无论是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游击区的反蚕食斗争和敌占区的反“清乡”斗争，都创造出了各式各样有效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诸如麻雀战、地雷战、破袭战、地道战，以及深入敌人心脏的武工队等等，在对敌斗争中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党在基层建立了大量不脱产的民兵，在乡、区、县各级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游击队，在县、军分区和小军区建立了适当数量的地方部队，在小军区和大军区建立了一定数量的主力部队。这一系列的武装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形成人民战争的海洋，不管敌人多么凶狠，最后也不能不在它的面前遭受灭顶之灾。

在政治方面，我党很好地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向中国人民指出打败日本侵略者既是爱国主义任务，也是国际主义任务。要把抗日战争看做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最巨大的贡献。我党也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日本帝国主义威胁民族生存的情况下，抗日是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但不能因为抗日就不敢提出改善工农生活的要求。只有适当地改善工农生活，才能提高他们抗战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保证抗战的胜利。不过改善工农生活要有限度，不要把阶级关系搞得过于紧张，破坏了团结抗日。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既代表工农的当前利益，也代表工农的长远利益。只有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

确地结合起来，才能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夺取抗战的胜利。

在统一战线方面，毛泽东同志总结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又根据抗战时期的新经验，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以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的正确方针；并指出，在与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作斗争时，必须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就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利，就是胜利的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有节，就是休战的原则。斗争要适可而止。斗争是为了团结，经过适当的斗争就应当妥协，以便继续合作抗日。正因为党领导人民正确地执行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才能坚持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抗战的胜利。

在发动群众尤其是发动农民方面，我党在抗战期间有很重大的创造。党在掌握了县区政权的条件下，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减租减息斗争，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使农民成为农村的主人，而又团结着地主和其他的人们共同对日抗战。这样的农村就不再是半封建社会而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了。从前，人们认为只有经过土地革命，农民才能翻身。现在，通过减租减息的斗争，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配合的斗争，就把农村根本改造了。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他们一旦觉悟起来，其力量是无穷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由共产党领导农民战争取得的。但是，由一个自由散漫的农民变成一个严守纪律的革命军人，很不容易。由一个思想保守落后的农民变成一个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先进分子，尤其困难。但是我党做到了。党在抗战中建立了百万人以上的军队，发展了百万人以上的党员。有人说中共的党员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农民党员，这是完全错误的。有觉悟的农民是可以成为共产党员的，正如知识分子由抗日民主的思想可以提高到共产主义思想一样，虽然不容易，但是办得

到，而且是实践证明了的。

在抗战时期，我党在自身的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许多重大的创造。党从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吸收了大量的党员。如何把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党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整风就是一项伟大的创造。整风，就是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在整风运动中，我党的主张是提高自觉性，去掉盲目性，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整风运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创造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更高度团结的方式。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党内矛盾，就能分清是非，团结同志，抛弃了以往“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那一套错误的作法。经过整风运动和随后召开的党的“七大”，使我党达到空前的团结，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抗战期间，我党制订和实行的正确政策，除上述各点外，还有生产运动、精兵简政、在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地方上实行拥军优属、军队实行拥政爱民，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重大的创造，都收到很好的效果。

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全面抗战的路线，人民战争的方针，它所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才能取得辉煌的战绩。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和民兵、游击队，在八年抗战中共对敌作战125000多次，消灭日军52万余人，伪军118万余人，合计170余万人。在敌后建立了大小不等的解放区19个，从敌人手中解放了我国领土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亿以上。与此同时，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损失了58万多人，老百姓牺牲的就更多了。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在抗日斗争中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1942年5月的反“扫荡”战斗中，临危受命，从容不迫地指挥战斗，掩护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八路军总部突出重围，而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太行山的十字岭上。正如朱德同

志的悼诗中所说：“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他的英名，当时就被人民传诵，今后也将永垂不朽。经过艰苦的斗争，到抗战胜利时，我解放区的军队已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兵发展到200多万人。从抗战开始，我八路军即用它的胜利，鼓舞了全国的军心和民心，配合并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自1938年武汉失守，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我敌后解放区战场即开始成为主要战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抗拒了半数以上的日军，至于伪军，则自始至终就几乎全部是對我解放区军民作战，被我解放区军民打得丧魂落魄，没有多大的战斗力。正因为解放区军民的艰苦奋战，解放区战场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才不但使日军无法征服中国，而且使全中国人心不死，反共顽固派不敢中途妥协，中国的抗日战争因此才能经过曲折的路程走到胜利的终点。

(二)

抗日战争是一切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不分民族种族，不分阶级阶层，不分党派和无党派，不分宗教信仰和无宗教信仰，不分性别年龄，不分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不分任何地域以至海外同胞，为了抗日救亡而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统一进行的一场民族自卫战争。简单地说，就是民族战争。

为什么炎黄子孙后面还要加上中华儿女呢？因为有人提出，炎黄子孙包括不了全中国五十几个民族的人民。如蒙古族人爱说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把台湾高山族人称为炎黄子孙也不很恰当。把中国所有的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则是大家都同意的，因为中华是全国各族历代统一的称号，中华民族是中华诸民族的意思，是中华各民族的总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因而形成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展开了全国一致抗日的民族

战争。在抗战中，各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例如回民的抗日武装，仅在华北就有好几支。著名的马本斋回民支队，英勇善战，人所共知。马本斋同志的母亲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更是我中华各族人民所共仰的英雄母亲。又如内蒙古人民的抗日斗争，尤其是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一直在敌人的深后方坚持着，其艰苦奋斗的精神，更为世人所敬佩。在抗战中，中国没有一个降日的民族，也没有一个亲日的民族。所谓“满洲国”、“蒙疆自治政府”，纯系伪组织，不代表满族和蒙族人民。正如后来华北、华中的伪组织以及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完全是敌人的傀儡，不代表汉族人民一样。无论是汉奸、蒙奸、满奸都只有一小撮，都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和叛贼。中国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达到空前未有的大团结是抗战取得胜利的根本条件之一。

中国各阶级、阶层在抗战中的团结也是空前的。工人阶级从“九一八”以后就是抗日斗争的先锋。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工人的抗战积极性高涨，尤其是华北，如平汉、同蒲、正太三路的工人，大部分都参加了抗日斗争，成千上万人直接参加工人游击队、八路军、决死队。农民对抗战的贡献是尽人皆知的。敌后抗日解放区由于依靠农民才得以坚持和发展。就是国民党统治区，抗战的负担也主要是落在农民身上，以补充兵员来说，仅四川一省在抗战中就出了300万以上的壮丁，其中90%以上是农民。尽管国民党的兵役政策弊端百出，农民苦不堪言，但这些壮丁组成军队后，在抗日战场上对日军作战还是十分勇敢的，为抗日救国不惜流血牺牲。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量的知识分子，首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开始后他们更加热情奔放，在保卫华北、保卫上海和保卫大武汉的斗争中，他们在文化战线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战中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倾向抗日。抗战爆发后，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受到极大的损

失。民族资产阶级对此极为痛心。尽管他们对迁往内地犹豫不决，但长江下游一些决心抗日的民族资本家，还是把他们的企业迁到大后方去了，并和本地的企业家一起，在物资生产方面支援了抗战。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也追随国民党政府参加了抗战。他们一方面在抗战中发了国难财，一方面也对抗战作了些有益的事情。沦陷在敌占区的资产阶级，无论是民族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也无论与英美商家关系较多或与日本商家关系较多的资产阶级），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压迫和凌辱，因此主动和侵略者合作以至当汉奸的极少，大部分是苟且偷安，有的则和工人们一起实行消极抵抗。其中民族意识较强的甚至暗中掩护和参加了抗日工作。地主阶级本是民主革命的对象，但因日本帝国主义者实行民族侵略政策，其奸淫掳掠是不分阶级的，上等人家往往首当其冲，因此地主阶级对日本侵略军也怀有民族仇恨，加上我党实行团结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民党本来就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还是抗日的，只有极少数地主分子才当了汉奸。就是当了汉奸的也常常动摇不定，真正死心塌地认贼作父的人，又是其中的少数。众所周知，军阀主要是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但在抗战中大多数军阀都能秉承民族大义而参加抗日。例如四川的刘湘，“七七”事变一发生就极力主战。在他的影响下，四川地方军队几乎全部都参加了抗战，共达30余万人，有的直接上了前线，有的在第二线作预备队。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川军作战非常英勇，王铭章将军坚守滕县城，以身殉国，对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川军在抗战中牺牲的将领还有李家钰、饶国华和许国璋等人。至于宋哲元所属的29军，因为是首先发动抗战的部队，那就更为著名了。在保卫北平的战斗中，赵登禹和佟麟阁两将军奋不顾身，首先为国捐躯。后来在襄樊作战中，张自忠总司令预先写下遗书，然后过河杀敌，其为国之忠勇，牺牲之壮烈，都是令人感动的。其他各省军队，如广西军、云南军等

等，也都在抗战中奋勇杀敌，流血牺牲，作出了贡献。只有极个别军阀部队的将领，如李服膺、韩复榘，才临阵脱逃，或拥兵自重，他们受到军法制裁是完全应该的。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很少投降敌人的。伪军大部由失意军人、流氓和土匪之类所组成。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一些原来打着国民党旗号抗日的部队就由反共而投降，成了伪军。到了抗战后期，在所谓曲线救国的谬论指导下，一些国民党军队公然与日本勾结，明当抗日军，实为反共军，如戴笠指挥下的忠义救国军，即是明证。这样就使伪军的数目大为增加，多至百万人左右。但是，总起来看，中国军民都是坚决抗日的，甘心事敌、为虎作伥的人，不仅为数甚少，而且都是民族的渣滓。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促使中国各党各派团结起来，抗敌救亡。国共两大党的合作是全国团结的关键。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于7月15日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国民党蒋介石。这时蒋介石虽然发表了“庐山谈话”，宣布了准备抗战自卫的方针，但仍希望用和平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因而把我党的宣言压着不发表。直到“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8月22日，国民政府才公布了红军改编的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一直拖延到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才公布了我党的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我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在抗日战争的炮火声中实现了。1937年8月，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公开致电国民党，支持抗战，并提出了坚持抗战的八大政治要求。随后，即加强了它的抗日活动。1938年4月，国家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先后致书蒋介石、汪精卫，申明各自的政治主张，蒋、汪分别予以回信。这样就用书信的方式承认了国社党和青年党的合法地位，从而扩大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救国会是在1936年5月成立的，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派别。1936年11月，它的七位主要领导人沈钧儒等被捕入狱，成为

震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被迫释放了他们，以后他们从事抗日民主活动更加积极。中华职业教育社本来是一个教育团体，“九一八”以后也从事救国活动，逐渐形成一个政治派别。抗战开始后，其政治积极性更高。乡村建设派抗战前在农村的活动多半依靠地主乡绅，但他们的政治倾向一直是抗日的。总之，从卢沟桥事变开始，中国所有的党派都参加到抗战中来了。中国没有一个汉奸党派。汪精卫等投敌，只带去国民党中的一小撮民族败类。江亢虎等附逆，也只是无政府主义者中的少数无耻之徒。中国人民，无论参加党派与否，大都能坚持民族大义，发扬爱国精神，参加抗日战争。少数卖身投靠敌人的汉奸卖国贼，都为众人所不齿，受到人们的唾骂。日本侵略者虽然能践踏中国的国土，却无法征服中国的人心，这就是日本之所以失败和中国之所以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国人大多数是不信教的。尤其是汉人，他们崇奉祖先，热爱乡土，绝不容许任何人侵犯他们的家园，践踏他们的祖宗陵墓。因此，每当异族侵入的时候，他们必定要奋起抵抗，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就是那些信奉了各种不同宗教的中国人，也都具有爱家爱国的传统，对异族侵略总是要反抗的。在抗战中，各种宗教徒都把他们的宗教教义和抗日结合起来，用以证明抗日的正义性。佛教徒说抗日是救苦救难、普渡众生；伊斯兰教徒说抗日是反抗邪恶；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则认为日本的侵略违背上帝博爱的意旨，中国抗日完全符合耶稣的精神。因此各派宗教徒都参加了抗日战争。从五台山的和尚到南岳衡山的僧长、尼姑和道士，都有抗日组织。西藏的喇嘛曾经一次就有十余万人同时为抗日做祈祷。至于伊斯兰教徒，由于他们的尚武精神，还有不少人直接参加了武装抗战，所以全国的回民武装即有数十支。他们在抗战中大显身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日本侵略者也曾利用宗教来欺骗和拉拢一些人给他们作工具，但收效不大。为异族当鹰犬，除少数会道门中的流氓头子之外，一般宗教徒也是不肯

干的。

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其广泛和深入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从白山黑水的抗日联军到海南岛的琼崖游击队，从东海滨的激烈战斗到西北、西南国际交通线上的繁忙运输，全国抗战的洪流波澜壮阔。不仅国内各族人民一致奋起抗日，海外一千多万侨胞也为抗战竭尽心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东南亚华侨最多，也最富于爱国传统。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一贯爱国爱乡，抗战开始后，他于1938年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每月向祖国捐献数百万元。新加坡的胡文虎兄弟，一次就捐献了200万元。早在1936年初，在司徒美堂等人的倡导下成立了纽约各界华侨抗日救国协会。接着，华盛顿、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地的华侨社团，也实现了抗日大联合。同年的“九一八”纪念日，欧洲侨胞组成了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抗战开始后，欧美侨胞的抗日热情更形高涨。他们大力为抗战捐献钱财和物资，如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邝炳舜，一次就捐款十万美金慰劳抗日将士。为了反对日本从美国运去钢铁等作战物资，美洲侨胞特别是工人和学生展开了坚决勇敢的斗争。为了反对抗战中的投降危险，陈嘉庚于1938年曾三次致电汪精卫，怒斥其叛国言论。并以参议员资格，向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提出了“敌人未退出国土前，公务员言和者便是汉奸”的著名提案。这一提案通过后，全国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华侨中有许多热血青年，不满足于在国外从事抗日运动，数以万计的人毅然回国奔赴抗日战场。其中如瓜哇女青年李林，回国参加了八路军，英勇地牺牲在抗日前线，成为举世敬仰的女英雄。

由于全中国人民包括海外的侨胞都积极地参加和支援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极其广泛和深入的发展，中国才可能进行统一的持久的抗日战争。如果中国是分裂的，中国抗战要坚持下来将是很困难的。为了实现全国统一，中国共产党作了很大的努力和让步，把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工农政权改建为抗日民

主政权，结束了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国民党也作了相应的让步，放弃了“剿共”内战的方针，承认了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合法存在。全国的统一实现了，全国统一对日作战的局面也就形成了。虽然由于抗日战争的特点，游击战在整个战争中具有重大的战略作用，使中国出现了两个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但是这两个战场，不仅从战略上看，自始至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有时在战役上也曾经密切地配合。例如八路军的平型关之战，就是和友军直接配合作战的。为了保卫太原，我120师在晋西北作战，115师、129师主要在晋东作战，著名的火烧阳明堡敌机之捷，对保卫太原的忻口战役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随后的山西作战中，国民党还拨出了一部分军队，交给朱德总司令指挥，和八路军一起在东路作战。又如在徐州会战时，八路军各部在华北敌后积极作战配合，新四军也在南面积极作战配合，特别是我党领导的山东部队破坏了津浦路的交通，给敌人制造了很大的困难，这些都是我国军队能在台儿庄取得大胜的直接和间接的因素。当1940年日军准备大举进攻我抗战的大后方，妄图压迫国民党屈服的时候，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打破了敌人的阴险计划。此后，敌人更加紧了对敌后解放区的进攻，这样就减轻了国民党战场的压力。为什么这里用解放区战场和国民党战场而不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名称了呢？因为从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也吸取了前一阶段作战的经验教训，并请叶剑英等同志为他们在衡山开办训练班，讲授如何进行游击战的方法。此后，他们也主动派部队留在敌人后方，敌后的国民党部队就更多了，不只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战场。而且当敌人在正面战场发动战役性进攻的时候，国民党军知道敌人兵力有限，他们除正面抵抗（有时不抵抗）之外，也学会了侧击、迂回等战法，迫使敌人不得不撤退，或者牵制住敌人，使其不敢再孤军深入。但是国民党始终不肯改变其片面抗战的路线，因此只能学到游击战的皮毛，而学不到它的精髓。尤其在敌后，国民党军队由于脱离群众而难于生

存，结果它反而迁怒于共产党，转而实行反共，最后由反共走向投降，大部分当了伪军。在敌后抗日，不坚决对敌斗争是无法生存的。而要坚决对敌斗争，只有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执行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才能开展人民战争，使敌后解放区得到巩固和发展。所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用解放区战场和国民党战场来表达两个战场的情况，更加确切。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抵抗日军是解放区战场在敌后得以开辟、坚持和发展的条件。而解放区战场坚持和发展敌后的战争又是国民党战场得以坚持下去的重要条件。这两个战场即使后来缺少主观的配合，在客观上也仍然是一个整体，是密不可分的。国民党军在抗战的第一阶段，作战是积极的、主动的、勇敢的。如保卫太原之战，国民党集中了近30万的军队，八路军也赶去参加，使日军吃了些败仗。在著名的忻口战役中，我军坚守忻口二十余日，奋勇杀敌，不惜牺牲，郝梦龄将军身先士卒，在距敌仅200余米处中弹殉国。与太原作战差不多同时，展开了淞沪大战。国民党集中了70余万军队，几乎使用了它全部的主力 and 7个师团以上的日本陆军以及占绝对优势的海空军，展开了浴血的战斗。继冯玉祥之后，蒋介石亲任这次大会战的指挥官。我军作战之英勇，牺牲之惨重，震动了全世界。尤其是为掩护大军撤退而坚守四行仓库的800壮士，在谢晋元团长的领导下，建立了全国人民共同赞仰的奇勋。淞沪作战3个月，虽然我军付出了约20万人的高昂代价，但也使日军损失数万人，打破了它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1938年2月开始的徐州会战，国民党军参加战斗的40余万人，在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首先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然后胜利地突出了敌人对徐州的包围。在随后的武汉会战中，国民党军101个师参战，敌人虽然侵占了武汉、广州等城市，但其迫使中国投降的计谋终归破产。我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正是主动地配合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作战。当然，没有正面战场的抵抗，也就无所谓敌后战场。在抗战初期，两个战

场的配合是比较密切的。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人逐渐把它的主要力量用来对付敌后军民，妄想巩固其占领区。这时，国民党军对敌作战的极积性和主动性减弱了，而且还不断地加强了与我军的“磨擦”，甚至一再掀起反共高潮。但是，为了保持它最后的生存，它对敌人的战役性进攻，也不能不实行抵抗。从1939年到1943年，国民党军进行了南昌战役、随枣战役、三次长沙战役、桂南战役、枣宜战役、豫南战役、晋南战役、浙赣战役和鄂西战役等十几个战役。在这些战役中，有些仗还是打得好并取得了胜利的，广西昆仑关之战便是一例；有些军队和将领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张自忠将军就是在1940年枣宜战役中殉国的。在这个时期，国民党军也曾经有过主动的作战，例如1942年远征军到缅甸去援助英军。这次作战极为艰苦，曾在台儿庄、昆仑关屡立战功的戴安澜将军，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后殉国。周恩来同志称赞他的这位学生为“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着三种迥然不同的社会制度。敌占区是日本侵略军野蛮统治下的殖民地。为了欺骗世人和便于统治，日军除早已建立的伪“满洲国”外，抗战初期又建立了华北和华中两个伪政权，后来又把二者合并为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但日本仍令伪汪与伪满各自“独立”，以便实行其所谓“中、日、满提携”。日军建立的伪组织，完全是敌人手中的玩具，国际上不承认它，中国人痛恨它，根本算不上什么国家。在国民党统治区则仍然维持着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国民党不但不实行民主，发扬人民抗战的积极性，四大家族反而利用抗战发财，党棍和特务们在一党专政的不变方针下更加横行无忌。尤其是到了抗战后期，他们眼看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日本败局已定，于是采取坐待胜利的方针，只顾扩大各自的势力。结果是势力膨胀了，但也腐朽了。只有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抗日解放区，才是从抗战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事物。解放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它的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解放区军民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